



在当代描画世界名城古时模样

唐克扬

这个暑期档,《长安三万里》热映。影片不仅展现了唐朝诗人李白、高适和杜甫的风采,还精心描画出唐代街巷坊肆的日常景象:在长安,高适与杜甫结识,于宴乐之上邂逅王维等文学大咖;在武汉,高适和李白两次造访黄鹤楼,描绘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景象。

树立保护意识,复现古城风貌

时光荏苒,1000余年后,长安已是“西安”,城市布局与唐代相比有了很多变化。近代以降,这座城市的唐风并不浓郁,直至2010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成,西安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复现古都风貌的独特路径:长安西市遗址上修建的大唐西市博物馆于原址“就地展示”,对汉唐城市遗址修葺则“修旧如旧”。6个仿唐街区复现“丹柱素壁”的建筑外表,商铺林立,游客熙攘,一派浓郁烟火气,一如今人对古代长安繁华街市的想象。

严格说来,历史文化名城难以真正“复原”。城市不是西伯利亚荒原上偶然发现的猛犸象遗迹,能在冰冻岁月中保持原貌。一座城市的社会生活如流水般奔腾不息,后人很难分辨汉代长安、唐代长安与宋元“长安”之间的区别。同时,即便古代城市规划设计明确,现有证据仍不足以完整复原整座城市。比如,初至京城便明白“长安居易”的白居易,年近五旬终于在长安新昌坊有了住宅。对此,诗人并未吝惜笔墨,但我们仅能从诗中依稀得知他住在新昌坊东边:“最近东头是白家”(《自题新昌居止因招杨郎中小饮》);且宅前有松:“但有双松当砌下”(《新昌闲居招杨郎中兄弟》),更多信息无从知晓。

那么,如何在历史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复现一座古代城市呢?答案早已不是秘密:如同棋局对弈,步步为营,古代城市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至今。理论上,我们可以立足此时此地,从现状推出一座城市最初的样貌。以西安为例,在时光长河中逆流而上,观察明清西安府城墙的营建,欣赏元初马可·波罗赞美的“城甚壮丽”,了解北宋吕大忠始建碑林的动机,感受盛唐帝都的万千气象,直到见证隋文帝营造大兴城的那一刻。

古城一如西安,是历史层累的鲜活见证,树立保护意识至关重要。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发展对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产生过负面影响,无论是1882年通过《古迹保护法》的英国,还是1949年建立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的美国,各国都有影响力的制度性保护措施出台都颇为晚近。由于保护意识的缺失,对建筑遗产过度拆除一度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通病。对城市而言,免于被破坏、被毁弃是最低标准,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加强修复,将建筑遗产的时钟调到恰当时刻,然后才能倒推城市发展的历史足迹。

只有以保护意识为基础,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建设城市的当代部分,保护修复历史文化部分,令城市的“旧”与“新”如地层剖面般清晰可见。于是,西安、巴黎、罗马、雅典成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置身其中的我们在感受当代生活气息的同时,也能够看到一座古城过去的模样。

合理利用古迹,让历史活在当下

借助沙盘模型,微缩再现古代城市,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城市的空间组织原则。例如,走进前门东大街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我们能看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规划模型之一——北京城市规划模型,在声光电技术配合演示下,这座面积达302万平方米的模型与周边1000平方米的射影影像交相辉映,犹如鸟瞰北京,目光自然不再局限于每座住宅,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复原了昔日的城市建筑功能。

借助新媒体技术,人们还可以在遗址上直观感受古今之别。比如,意大利罗马的戴克里先浴场曾是古罗马帝国时期最大的浴场之一,今天的浴池虽已干涸,但建筑遗址中依然播放着当时的洗浴场景,古代罗马人的日常生活因而得以重构。

活化利用历史遗址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在法国阿尔勒和意大利维罗纳,当地政府对古罗马时期的圆形剧场加以修葺,令古迹变为演出场地,时尚的当代娱乐和古老的城市空间直接对话:梵·高画笔下的阿尔勒竞技场依然在举办斗牛表演,英国流行歌手阿黛尔曾在维罗纳古老的圆形竞技场举办演唱会。不同于近代镜框式舞台,这些圆形剧场消除舞台和观众间的隔阂,声浪和视线更易汇聚到椭圆形舞台之上,而环绕舞台、座无虚席的观众本身就复现了古罗马时代的演出场景。

一座城市的古今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城市的历史也不总是博物馆玻璃柜中的展品。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公园、罗

携手向未来

——南非纪行

毛明超

当飞机降落在南非德班的沙卡国王国际机场,南半球的冬日夕阳正洒下最后一缕橘色的光芒。舷窗外晚霞绚烂,冬日无雪无霜。印度洋沿岸的厄加勒斯暖流一路向南,令这里最寒冷的7月也常有春的暖意。今天的德班是南非第三大城市和非洲南部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这片大陆联通世界的重要窗口。前不久,作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选派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我们一行8人来到这里,参加第九届金砖国家青年峰会。

历史文化印记犹深

德班曾属于古老的祖鲁王国,在祖鲁语中被称为“伊泽圭尼”(意为“泻湖”)。直到今天,祖鲁传统依旧浸润着这座城市的生活。刚出机场,我们的目光便被前来接机的南非青年吸引。男青年们按照传统风尚打扮成祖鲁族武士的模样,上身赤裸,腰间与小腿分别系着“伊斯内内”与“阿玛硕巴”,即带毛的羊皮与牛尾制成的皮裙与护胫,象征武艺与礼仪。他们裸露双脚,一边转动一边用力快速蹬踏地面,时而手撑地,时而腾空翻,闪转腾挪,以这种名为“乌库吉达”的舞蹈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德班不仅传承了古老祖鲁王国的文明,也培植着今日南非的根须。从市中心往西北方向驱车约30公里,便到达伊南达镇。这里保存着不少知名历史建筑,其中之一就是甘地故居,一栋单层的白色木结构板房小楼。1893年,24岁的甘地离开印度,远渡重洋来到南非,在此旅居二十一载。1904年,甘地在伊南达镇买下万亩土地,建起凤凰新村,边劳动边哲思,并与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保持着书信往来,建立起深厚友谊。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托尔斯泰传》中,就收录了托翁在逝世前两个月写给身在南非的甘地的信。信中,托尔斯泰谈到了他们共同关注的主题:爱。“爱,或者以别的名词来沟通人类心灵的渴望,是人生惟一的、最高的法则。这是每个人知道,并在心底里感受到的。”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对爱的阐释与表达各有不同,但超越时空的无疆大爱始终值得景仰。

距离凤凰新村不远就是伊南达镇的另一处历史建筑,奥兰格高中。学校的创建者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原称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首任主席约翰·杜比博士与妻子诺库特拉。杜比生于德班,长于德班,长眠于德班。怀着对故乡的爱,他将一生都奉献给这片土地。设立于1901年的奥兰格高中是南非第一所由黑人建立的学校,创立之初就非常重视黑人学生的基础教育与职业技能。这在上世纪初的南非并非理所当然之事。办学事务繁重,免不了遭遇种种困境与挫折,但学校至今依然惠及当地的孩子们。我们到达学校时,正值学生放学。见到我们,身穿黑色西装校服的学生立刻放下书包,在台阶上排好队伍,跟随老师指挥,用动听的合唱欢迎我们。我大致听出歌曲结尾表示感谢的祖鲁语“希亚柳伽”和科萨语“希亚布雷拉”,却不知道前几句歌词的含义。南非朋友努杜米索告诉我,孩子们唱的是一句祖鲁习语,大意是“你的成就造福后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大约是一代代奥兰格学子对杜比博士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吧。

文学音乐连接人心

努杜米索目前在约翰内斯堡工作。昔日淘金者的乐园,如今已是南非的经济中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即将在这里召开。在传统矿业与新兴金融业外,约翰内斯堡也是一座文化与创新之城。城市北部的金山大学培养出4位诺贝尔奖得主:政治家纳尔逊·曼德拉、化学家亚伦·克鲁格、分子生物学家西德尼·布伦纳,以及被誉为“南非良心”的女作家纳丁·戈迪默。今年恰逢戈迪默百岁诞辰,书店里,她的代表作如《七月的人民》《我儿子的故事》等被摆放在“当代经典文学”区的显眼位置。戈迪默擅长以细腻笔触描绘普通人在特殊社会环境下经历的心灵震荡。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她的文学创作高峰,同时也是南非族裔矛盾加深化的历史时期。戈迪默的小说叙述技巧高超,她不仅以白描还原现实,更能巧妙运用视角交互的手

法,让笔下若即若离的人物以他者视角观察旁人的言行与生活,在形成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的同时,直指问题实质。因此,她的小说常被称为“历史的内心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戈迪默的小说延续了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对“现实主义”的定义,即以个体命运展现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展现出这位作家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洞察。

在第九届金砖国家青年峰会的开幕式上,我们切身感受到南非音乐的动人魅力。为拉近金砖五国青年间的距离,让歌声为峰会增添斑斓色彩,主办方邀请女歌手依佐演唱歌曲《帕塔帕塔》。在科萨语中,“帕塔”意为“触碰”。这首歌在南非脍炙人口,流行于上世纪50年代约翰内斯堡郊外的索菲亚镇,曲调融合了祖鲁民歌的和声风格与非洲流行音乐元素,非洲手鼓凸显出快板的鲜明节奏,弹拨乐器的低音则将女声高音衬托得更为悦耳。《帕塔帕塔》的原唱是被称为“非洲妈妈”的约翰内斯堡歌手米拉姆·马卡巴,她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坚持为一个更平等、更自由的南非而歌唱。

身着橘色套装的依佐刚一开口,在场的南非朋友和各国青年代表纷纷在欢快的旋律中站起身来,披上由南非国旗的6种颜色(红蓝白黑黄绿)织成的围巾,用双手轻拍自己的头、肩、腰、髋,先跟随轻快鼓点微微屈膝,再摇摆着直身站立,左右微微旋转身体跳起舞来。每个人都绽放出无拘无束的开怀笑容。音乐和舞蹈拉近各国青年的心灵,大家共同分享着此时此刻的友爱与喜悦。

未来之路寄望青年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金砖合作的未来。为期3天的金砖国家青年峰会上,我们与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同龄人热烈而深入地交流了关于未来教育、经济复苏、能源转型、非洲自贸区等问题的看法,介绍了中国的立场、构想与倡议。讨论中,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合作与发展是金砖国家共同的追求,各国代表都对中国的发展成就充满敬意。南非官员们反复表示,应当着力借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

冠军树

乔鲁京

旅人心里话



在南非国家公园观察久了,会看到一种情况:凶猛的狮群来袭,非洲野水牛会钻入灌木丛,而狮子们很忌惮,不敢再贸然进攻。当地向导说,这种灌木叫做凸枣,枝条曲折,每个弯曲的节点都生出两根利刺,一勾一直,一旦被扎便难以脱身。故而凸枣树成为非洲野水牛的“避难所”,又别名“水牛刺”。在南非祖鲁人的传统中,凸枣树寓意深远:弯曲的枝条如同人生境遇起伏跌宕,枝条上的每个节点仿佛一次次遭遇转折,勾刺象征不要忘记过去,直刺则代表放眼未来。

1998年,南非出台《国家森林法》,规定某些树种、单独一棵树或树群都可以受到保护。以此为基础,2003年,南非政府启动“冠军树”项目,旨在认定全国范围内需要保护的树木。想要成为“冠军树”,可并不容易。如果依据自然生物学标准申报,需综合考虑树木直径、高度和冠幅,依照特定计算公式评估;倘若根据文化遗产标准申报,则

要综合审美、景观、历史、文化、经济5个方面综合打分,满分10分,高于6分才有资格入选。经过严格评估,截至2018年,南非先后有93棵“冠军树”通过认定,其中5棵后因各种原因遭到除名。

84号“冠军树”的生长地颇具历史意义。这是一棵高近40米的印度榕,扎根桌山北麓、开普敦老城区“公司花园”入口。17世纪中期,“公司花园”初具雏形。在大航海时代,现代生物分类学开始勃兴。当人们漂洋过海,从南亚带回印度榕树苗栽种于“公司花园”入口时,这里已然成为植物学研究的一处重镇。

这是一棵名副其实的“冠军树”:它见证开普敦反种族隔离的历史过往;它遥看10公里外大海中的罗本岛,纳尔逊·曼德拉曾在那里度过漫长的18年岁月;它听到800米外的开普敦市政厅传来的声音,那是曼德拉正在发表公开演讲……经历风雨后,这棵大树终见

“浩气展霓虹”。

告别84号“冠军树”,从“公司花园”出发,沿桌山顺时针驱车12公里,便抵达东南麓的科斯滕博什国家植物园。1903年,英国植物学家亨利·皮尔逊来到开普敦执教。他发现当地植物种类非常丰富,便于1913年创建了科斯滕博什植物园,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座以保护本土植物为主旨的植物园。

英国植物学家罗纳德·古德参考这里的研究结果,于1947年将全世界的植物划分为六大地理区系,其中占全球陆地面积不足0.5%的开普地区由于拥有近万种维管植物,且特有种类繁多,被单独划分为一个植物区系——“开普植物区”。尽管在2023年科学家们更

新了世界植物地理区系,将开普植物区并入非洲区,但这里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植物种类之多样与亚马孙热带雨林媲美。因此,2004年,包括桌山国家公园在内的7处保护区以“开普植物区保护区”之名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探访科斯滕博什国家植物园时,我看到许多小学生正在接受自然教育。草坪上,鲜花前,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和求知的眼神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如同周遭的茂盛树木,他们也将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自由健康地成长。

2010年,南非诗人凯奥拉佩策·考斯尔到访中国。1938年,考斯尔生于约翰内斯堡,1969年发表个人首部诗集《挣脱锁链的精神》。他的诗歌兼具非洲口头文学的节奏感与爵士乐的韵律感,直抒胸臆,情感丰沛,字里行间充满艺术想象力。2006年,他被授予南非“国家桂冠诗人”称号。终其一生,考斯尔始终以“大写的和团结的我们”作为创作的信条。金砖国家青年峰会期间各国青年欢聚一堂的热烈气氛,令我时常想起考斯尔,他为2002年非洲诗歌大会创作的诗歌《伊泽圭尼》一次次在我心中回响。于是,在闭幕晚宴上,我为在场的每个人,朗诵了这首诗的最后一段:

“这里,在海洋的众声中间,/河流像舞者般流淌,/而你须翻越绵延的山脊,/无论你想去往何方,/我在这里遇见整个世界,/它运转着一如这片海洋。”

时光为合作写就伏笔。10年前,金砖国家领导人倡议举办“金砖国家青年政策对话”,揭开金砖国家青年合作的序幕;如今,金砖国家的青年正携手书写新的精彩。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本版责编:王佳可 徐馨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